

事件观

《武训传》解冻释放了什么信号

王晶晶

一部在传说中停留了60年的黑白电影，终于抖落历史尘埃，重现本来的面目。

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禁片”的《武训传》，最近由一家国内民营传媒企业发行DVD，售价99元，面向公众发售，并很快就卖断了货。没有任何征兆，这部长期处于人们回忆和想象中的电影突然“重见天日”，并引来追捧。

在震动之余，人们几乎是欢呼的姿态迎接这个遗失许久的故事。

《武训传》讲述了清朝末年，山东人武训靠沿街乞讨为穷人兴建免费学堂的经历。这部电影由孙瑜执导，赵丹、黄宗英等人出演。1950年公映时，“场场满座”。

然而仅仅一年过后，《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措辞严厉地将这部诞生于新解放区的电影定义为“反动宣传”，并认为对于《武训传》的歌颂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一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持续半年之久的文化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武训传》随即被禁止上映，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打击或牵连。受此影响，1952年国产电影的数量从前一年的23部下降到8部。当时负责上海宣传工作的夏衍回忆：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

艺术创作多了禁区，艺术创作者也为自己设置禁区。有学者认为，由批判《武训传》开始，新中国电影立下了3个标杆：电影是政治的宣传工具，电影人是马列主义者，电影艺术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这部中国电影史无法回避的影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文字描述，却无法出现在银幕上。并非因为其拷贝遗失或者损毁，而是它已成为一场批判运动的敏感符号，一个超越文本的政治标本。尽管在1985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胡乔木讲话，可视作为《武训传》平反，然而笼罩在它头上的面纱并没有被揭开。

上世纪80年代，一位研究中国电影的人

英国学者第一次到访北京时，就对这部被称为“中国禁片史开端”的影片无比神往，但最终没有机会看到。20多年后，他又拜托自己的中国籍学生，帮忙寻觅《武训传》的碟片，最终也无果。

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被禁止公映却因此家喻户晓的影片，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这种“禁片”特有的神秘感，随着时间累积愈加浓烈。2005年，赵丹诞辰90周年，上海和平影院举办了一场《武训传》内部学术放映。一位只在专业书中听说过

这部电影的女大学生，拿着系里的赠票前来“补课”。然而这难得的银幕一瞥，却让她有些失望。

“坏人的形象太脸谱化了。武训老是跟人下跪磕头，看着有点恶心……本来以为这部电影会多么‘反动’，可看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已经很‘革命’了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这样说。

这是一场久别后的相逢，迎接它的却并不是一边倒的称颂。当普通人也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武训传》DVD碟片，或是

在网上下载到视频资源时，对于“禁片”的热切期待，化为更加冷静的审视。

豆瓣网上，一些迫不及待看完影片的人，却感觉有些“怪怪的”。有人略带失望地写道：“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慢条斯理地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以现在的审美习惯回望这部60年前的电影，也许的确会有些许不适，其在艺术表现上也许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从一朝被禁，到越禁越向往，再到今

日“解禁”后的有赞有弹，恰恰说明艺术终于回归到艺术本身。当《武训传》不再遮遮掩掩、神秘神秘之时，反倒可以回归常识，心平气和地运用理性去审视它，然后自己作出判断。

脱离了阶级斗争束缚的《武训传》，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也许又会被解读为某种“开放”的象征。一部影片因为一场政治运动变得不再普通，又可能会因为一场商业行为而被赋予了各种含义。不要神化电影的力量，它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场精神桑拿而已。



春光乍泄

3月25日，郑州从持续近一周的阴雨中脱身，公园绿地上人头攒动。

杜小志摄

“让社会自己管好自己”

本报记者 林衍

获知一个信息后，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连电话都没顾不上拨”，开车直奔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民政部办公楼，敲开了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的门。

“温总理都讲了，孙局你就别再等了。”王名开门见山。

就在前一天，3月19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在北京举行。据与会人士透露，出席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创新，拓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范围的要求。

王名记得，他此前已经几次邀请孙伟林参加以“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学术沙龙，孙伟林都以“现在还不好说”为由婉拒。

在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一直遵循“双重管理”制度，即社会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挂靠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这被民间社会组织戏称为“找婆婆”，绝非易事。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在中国至少有300万个无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相比于已登记注册的45万个“合法组织”，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3月22日，孙伟林和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一同出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层的小会议室里。

作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方案的“操刀手”之一，在沙龙现场，孙伟林向记者详细阐述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背景、动因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

一旁的李勇则将这种以“统一直接登记”为特点的新体制，比喻为一场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并直言不讳地判断：“不改革，中国社会组织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把应该挡的挡在外面了，不该挡的也挡在外面了

很多事实表明，一场与社会组织有关的改革正欲破茧而出。

今年两会期间，“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经过代表们审议，报告修改稿中又加入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这句话。

在去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则首次设专章阐述未来5年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

李勇说，改革的核心就在于“体制”。

事实上，现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已经运行了24年。在一段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沉浮中，可管窥政府与社会悄然间变化的关系。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社会组织

- 中国目前社会组织的登记率，每年净增长仅维持在2%到3%。
- 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而中国仅为3个。
- 中国的基金会每年新增100个以上，而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天就会新增8个。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这被称为“第三部门运动”。在中国，“社会”一词则是1900年左右才进入的舶来品。1908年，清朝政府在《宪法大纲》中首次认可民间社团。

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被国家“吞噬”，人们的习惯用语中，“社会”往往意味着不信任与敌对，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等。

1950年，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依法取缔各种反动社团。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文革”期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彻底陷入瘫痪。

“改革开放后，逐渐多元化的社会有了孕育各类社会组织的需求。”李勇介绍道。

1986年，《民法通则》从基本法层面明确了社团的法律地位。自1988年起，国务院先后针对三大类社会组织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

从第一个条例诞生，双重管理体制便如影随形。

“这种管理体制的好处是，它保证了社会组织在政治上都是可靠的。”孙伟林肯定了这种管理体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然而，制度本身的弊端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孙伟林坦言，那些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常常以“不可靠”作为标准来衡量民间组织。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你做事总要有所图。但是你对民间组织图什么呢？它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相反，还有可能带来风险。”曾有官员这样对媒体解释当“婆婆”的烦恼。

李勇说，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应该挡的挡在外面了，不该挡的也挡在外面了”。

另一方面，一些找到了“婆婆”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才是“应该挡在外面的”。据孙伟林观察，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都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往往利用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威开展工作”。

珠三角的一位行业协会会长曾在媒体上“大吐苦水”，“业务指导部门‘七’要组织‘唱红歌’，协会必须得赞助点资金；明天去哪里红色旅游，也要协会表示下、赞助点”。

事实上，很多行业协会就设在政府大院里，有的行业协会甚至要求县市级设置相应的协会来与之配套。李勇说，国内相当

一部分社会组织的选举是举手制、鼓掌制，并不在乎内部章程。

曾有观察者戏称，一些对于行政机构依附程度极深的社会组织正在成为“养老院、小金库、二政府”的“养小二”机构。

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发挥余热型”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草根型的社会组织却举步维艰。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社会组织的登记率，每年净增长仅仅维持在2%到3%。”在沙龙现场，李勇无奈地摇了摇头。

据统计，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而中国仅为3个。还有人专门就社会组织中的基金会做出统计，中国的基金会每年可以新增100个以上，而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天就会新增8个。

孙伟林还举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例子。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曾有一个到香港注册社会组织的代办处，“交200块钱，递张纸给它，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双重管理体制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所有的优势都已经告一段落，必须要进行改革。”李勇毫不客气地说。

很多人会想：别改革了，躺在那里挺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令改革者们始料未及的是，破除旧体制远没有想象中顺利。

去年3月，民政部便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旨在建立“统一直接登记”的新体制。与此同时，20多个配套的政策法规也已经准备就绪。

然而一年过去了，孙伟林口中的“东风”——3个条例的修订结果，仍然没有公布。

这让他想起了与民政部门有关的一桩往事。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殴打身亡，不到半年里，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

“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十年磨一剑就是不出来，百万个社会组织期待它就是不出来。”李勇用一连串的“不出来”表达自己的无奈。而孙伟林则笑言，要是这3个条例的修订工作能获得像《校车安全条例》那样的重视，“那就好了”。

但他们随即告诉记者，条例的修订需要征得所有部委的同意，法制办同样“很为难”。

“为难”之一是部门利益。

“真要是把体制拿掉，它说，这不行，我的权没了。”李勇坦言，仍有少部分政府部门对改革持保留意见。

强大的行政背景导致了监管困难。据透露，中纪委曾希望与民政部合作，查处一些有问题的“二政府”，但很快就有关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来。

“很多人就会想，别改革了，躺在那里挺好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李勇总结道。

更深层次的阻力则来自观念。王名说，依旧有些人对于直接登记有顾虑，担心会不会一放就乱，“一提社会组织就害怕”。

在国际上，社会组织已经被公认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一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36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规模相当于一个1.3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其支出规模可排在世界第7位。

王名则记得，2004年，有一个国内市长学习班赴美国华盛顿市交流。美方市长用了很长的时间热情款待他们。忙惯了的中国市长们狐疑地问：“我们一个市长加七八个副市长，天天24小时不关机都忙得不得了，你怎么整天没事儿干？”

“大部分事情都靠民间组织的自治来解决。”美方市长笑着回答。

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无疑承担了这场社会组织建设改革中的“敲门砖”角色。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就此问题分别采访了深圳市市长许勤与广东省副省长刘昆。

许勤认为政府角色的调整是关键，“要让更多社会组织更好地发育成熟，继而承接一些政府职能转变的事务，让政府和社会互相配合起来。”

刘昆则表示，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不是很符合目前实际的需求，应该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让社会自己管好自己”。

而对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两位“改革派”官员来说，一个好的开始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在沙龙现场，孙伟林又一次强调了温家宝总理对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态度，“一个大国总理能够讲到这个程度，要求得这么清晰，还要怎么到位呢？”

李勇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为这项“老百姓叫好政府得分”的改革鸣锣开道。

“在高声喊出‘直接登记’这4个字的同时，我们还会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统统建立党组织，形成强大的政治后盾。”他信心满满地说。

提起“双重管理体制”，人们总会想到李连杰的壹基金。2010年9月，穿着10块钱的布鞋、头发花白的李连杰接受了央视采访，他把长期挂靠在北京红十字会的、没有独立账户的壹基金称之为“没有身份证的孩子”。4个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成为中国首家无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

事实上，深圳的“先行先试”绝非一意孤行。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曾就此事询问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短信回复他：“感觉很好”，“高度共识，共同奋斗”。

条例未动，破冰全国层面，民政部恰是寄望于地方试点破冰全面改革的。

2009年，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部市合作协议”，鼓励深圳“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当时王名也在现场，他清楚地记得，时任民政部副部长李学举说过这样一段话：“深圳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突破现行法规，准确地说，是可以违反现行法规。”

同年7月，民政部与广东省签订“部省合作协议”，其中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被列为第一项。迄今为止，民政部已和17个省份签订了合作协议。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已先后探索双重管理体制，实行部分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

从今年7月1日起，广东省直接登记的范围将扩大至所有社会组织。

“广东省的改革步子最大，但社会组织与政府唱对台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李勇强调。

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名则惊喜地发现，广东省政协将正式在县一级层面设立社会组织界别。

在去年11月召开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讲：“我们有精力管的都没搞好，没精力管的好像都搞得挺好。举个例子，广场上跳舞，组织得挺好，当初我们党就是依靠群众打天下，我们怎么能不相信群众呢？”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在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按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将经历“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以及“伙伴关系”。

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无疑承担了这场社会组织建设改革中的“敲门砖”角色。

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就此问题分别采访了深圳市市长许勤与广东省副省长刘昆。

许勤认为政府角色的调整是关键，“要让更多社会组织更好地发育成熟，继而承接一些政府职能转变的事务，让政府和社会互相配合起来。”

刘昆则表示，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不是很符合目前实际的需求，应该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让社会自己管好自己”。

而对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两位“改革派”官员来说，一个好的开始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在沙龙现场，孙伟林又一次强调了温家宝总理对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态度，“一个大国总理能够讲到这个程度，要求得这么清晰，还要怎么到位呢？”

李勇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为这项“老百姓叫好政府得分”的改革鸣锣开道。

“在高声喊出‘直接登记’这4个字的同时，我们还会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统统建立党组织，形成强大的政治后盾。”他信心满满地说。

新闻眼

陈倩儿

活到老，等到老

人的一生，用于等待的光阴不会少。年轻时，那叫盼，老了，便成了熬。所有的老人都在或多或少的煎熬中等待死亡，但一些老人还要先等到一个临终之前的安身之所。

自老伴儿去世后，80岁的北京老太兆芬便与两只老猫相依为命。她说，未来的路，自己不能靠子女。她一心想着要等到一个能照顾自己的养老院，但北京的两所公办养老院，她排队等了4年，依旧是“没床位，还得等”。其中一所养老院，与兆芬一同排队的有7000个老人，估计至少等10年，兆芬才能排上号。

等着等着，流逝的就不光是时间，还有尊严。兆芬已经无力收拾房子，屋里整天弥漫着酸臭的味道。倔强的她受不得自己颜面扫地，将所有来访的客人拒之门外。

但如果兆芬自己更有钱，情况倒也不是这么糟糕。她曾经去看过一个民办养老院，星级酒店般的条件让她很满意，但高昂的收费她怎么也负担不起。条件差些的，她又心里害怕，她记得，新闻报道说那里“折磨老人”。

可继续等待，迎来的或许是另一种折磨。悬殊的供求关系让养老服务乱了套。一些公办养老院见了不能自理的老人便拒绝接收，入住前老人反而要被养老院面试，面试之后还有试住，“不及格”的话随时会被劝退。

据说，只要再等3年，到了“十二五”的末尾，北京乃至全国的养老服务都会有所改善。这对一些人来说，是清晰可见的未来，但对兆芬这样的耄耋老人而言，等待是艰难的，甚至，每一个明天都是难以想象的。

杜甫也娱乐

但凡碰过语文课本的人都知道，诗人杜甫早已成了一个符号：他忧国忧民，沉郁悲苦，即便随意往大石块上一坐，也满脸若有所思。但这个严肃形象最近却被一股娱乐力量撕裂了。

语文书的插画里，杜甫不再正襟危坐。他开摩托也骑白马，打气枪还卖西瓜，转眼坐到石头上，也不忘把玩手机，或上QQ空间写写诗。这当然不是语文课本改了版，而是网民突发热潮，兴起“涂鸦”杜甫。眼下，这位活在1000多年前的诗人已经变换了200多个新形象。

他会装酷戴墨镜，骑车上街去买菜，还喜欢坐在马桶上揣摩一下诗词创作。这一切原本轻松，但被“权威人士”看在眼里，却全是歪斜之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负责人斥责网民“篡改诗圣”，河南省诗歌协会会长更警告大家可不能丢了“民族底线”。娱乐是个不羁的年轻人，严肃的老大爷一上场就扇耳光。

殊不知，小年轻越起越叛逆，涂鸦活动不但没停歇，还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网民模仿杜甫语气，引用杜甫诗句，虚构了杜甫与我们当代人的谈话录，还创作出杜甫致网络诗者之信。“杜甫”在信中西天取经，拆迁时舞，对当下社会问题冷嘲热讽一番之后，宽容地接受了网民的大胆创作。

老大爷一不留神，小年轻就聪明地迂回反击。其实在娱乐的背后，众人并非不敬重杜甫，而只是拒绝接收权威塑造的第一符号。民间的力量在娱乐，也在解构。老大爷，您这时最省心的做法还是一笑而过吧，在娱乐面前，您一本正经，可能就输了。

生命还严肃吗

人类的心力开始赶上智力了。

在许多大城市里，医生们一边忙着用试管婴儿技术创造新生命，一边却为如何处理为数众多的“备选胚胎”而耗尽了心力。

为了帮助有生育困难的夫妻，试管婴儿技术会一次性培育多个胚胎，其中一个被顺利植入母亲子宫后，其余的则成为“备选”。一些夫妻为人父母后就不再理会“备选胚胎”，也有人曾与医院签订保存胚胎协议，但久而久之，也不再续交昂贵的保存费用。

眼下，深圳、武汉、乌鲁木齐等地的医院都分别保存着成千上万的“备选胚胎”。如何对待这些特殊的生命形态，成了让人焦灼的伦理难题。他们是人类生命的最初模样？抑或是，他们还算不上鲜活的人类生命，只是一个经过几次分裂后的受精卵？

就像制造他们的时候那样，医生们如今也可以便利快速地将一切了结。但转念一想，他们的存在又还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条件适宜，这些胚胎便能继续孕育生长，变成嚎啕大哭的婴儿，活力四射的少年，又或，另一位慈爱温柔的母亲。

科技脚步跑得快，人类的心智远远没能跟上。但愿在我们无从预测的未来，生命的创造，依然严肃得让人敬畏。